



新文學選集

朱自清選集

開明書店

# 朱自清選集

〔乙種本〕

每冊定價10,500元

32開本280定價頁

---

|     |                                     |
|-----|-------------------------------------|
| 著者  | 朱自清                                 |
| 編輯者 | 新文學選集編輯委員會                          |
| 主編  | 茅盾                                  |
| 出版者 | 開明書店<br>(北京西總布胡同甲50號)               |
| 印刷者 | 北京人民印刷廠營業分廠                         |
| 發行者 | 三聯·中華·商務·開明·聯營·<br>聯合組織<br>中國圖書發行公司 |

---

1951年7月初版

分類12書號8850(販)

1952年7月乙種本初版

1952年12月二版 (3001-10000)

有著作權\*不准翻印



朱自清先生遺像

(一九三一年夏，出國前攝於上海)

中年便易傷哀樂老境  
何當計短長哀疾常防  
兒輩覺童真豈識我生  
忙室人相敬水同味親友  
時看星墜光筆妙感予  
宵不寐羨君行健尚南強

夜不成寐憶素雅老境一文感而有作

錄

景超兄

業雅嫂 補壁并乞教正 弟朱自清





一九三二年在北平與夫人陳竹隱合影



一九四六年抗戰復員後與家屬  
攝於清華園



書 齋

## 編輯凡例

一、此所謂新文學，指「五四」以來，現實主義的文學作品而言。如果作一個歷史的分析，可以說，現實主義是「五四」以來新文學的主流，而其中又包括着批判的現實主義（也曾被稱為舊現實主義）和革命的現實主義（也曾被稱為新現實主義）這兩大類。新文學的歷史就是從批判的現實主義到革命的現實主義的發展過程。一九四二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的講話發表以後，革命的現實主義文學便有了一個新的更大的發展，並建立了自己完整的理論體系和最高指導原則。

二、現在這套叢書就打算依據這一歷史的發展過程，編輯「五四」以來具有時代意義的作品，以便青年讀者得以最經濟的時間和精力獲得新文學發展的初步的基本的知識。本來這樣的選集可以有兩種方式，一是按照作品時代先後，成一總集，又一是個別作家各自成一選集；這兩種方式互有短長，現在所採取的，是後一方式。這裏還有兩個問題須要加以說明。第一，這套叢書既然打算依據中國新文學的歷史發展的過程，編輯「五四」以來具有時代意義的作品，換言之，亦即企圖藉本叢書之助而使讀者能以比較經濟的時間和

精力對於新文學的發展的過程獲得基本的初步的知識，因此，我們的選輯的對象主要是在一九四二年以前就已有重要作品出世的作家們。這一個範圍，當然不是絕對的，然而大體上是有這麼一個範圍；並且也在這一點上，和人民文藝叢書作了分工。第二，適合於上述範圍的作家與作品，當然也不止於本叢書現在的第一、二兩輯所包羅的，我們的企圖是，繼此以後，陸續再出第三、四……等輯，而使本叢書的代表性更近於全面。

三、本叢書第一、二兩輯共包羅作家二十四人，各集有爲作家本人自選的，也有本叢書編委會約請專人代選的，如已故諸作家及烈士的作品。每集都有序文。二十餘年來，文藝界的烈士也不止於本叢書所包羅的那幾位，但遺文搜集，常苦不全，所以現在就先選輯了這幾位，將來再當增補。

新文學選集編輯委員會

一九五一年三月北京

一

這本選集，是當朱自清先生的全集行將出版的時候選定的。全集共五冊，二十六種，近兩百萬言。其中詩歌、散文、雜論及批評，幾占全集的二分之一。這裏只是從這二分之一中選取詩七首，文三十二篇，大約不過十五萬字的篇幅。

爲了使這本選集能如期付印，選錄時所根據的都是已經出過單行本的作品。正在排印着的全集中的文藝之力、語文續拾、語文影和雜文遺集等均未選到。這幾種裏的文章也並非全無可選，但比較起來，卻是並不怎麼重要的。

爲了從這本選集能看出作者在思想上作風上的變化發展，這裏自始至終都是按寫作前後排列的，從一九一九到一九四八。本集共分三輯，大致是按類別：第一輯是詩，第二輯是散文，第三輯是雜論和批評。照比例看，第三輯的分量相當重，因爲這是朱先生三十年辛苦工作的頂點，從這一輯，可以看出朱先生的進步，可以看出他如何改造自己，堅定自己，並把自己的生命和用生命所創造的一切都獻給了人民。

二

朱先生的文學工作從創作開始。他先寫詩，以後又寫散文。在當時的作家中，有的從舊壘中來，往往有陳腐氣；有的從外國來，往往有太多的洋氣，尤其是往往帶來了西歐世紀末的頹廢氣息。朱先生則不然，他的作品一開始就建立了一種純正樸實的新鮮作風。他的第一本書是蹤跡，蹤跡的第一首是光明，他感到世界的黑暗，他急切地要求光明，而他的結語是：

條要光明，你自己去造。

這是一種簡單明快的積極生活態度，這是對自己負責，對生活本身負責的態度。蹤跡中的長詩，也是當時最引人注意的詩，是毀滅，然而這裏並不是人生的毀滅，而是現實生活的肯定。他充滿了慨歎地說：

況死之國又是人鄉，

知道它甚麼土宜啣！

只有在生之原上，

我是熟悉的。

所謂「生之原上」，就是我們大家共存共活的這片土地，這個世界，在這裏人可以切實生活，纔可以創造光明。

他以後之所以不寫詩，也不寫其他，而專寫散文，這一方面是生活所形成，一方面是他自己反省的結果，他是有意識地這樣作的。他在背影自序中說：

我是大時代的一名小卒，是一個平凡不過的人。才力的單薄是不用說的，所以一向寫不出什麼好東西。我寫過詩，寫過小說，寫過散文。二十五歲以前，喜歡寫詩，近幾年詩情枯竭，擱筆已久……我覺得小說非常地難寫；不用說長篇，就是短篇，那種經濟的，嚴密的結構，我一輩子也寫不來！我不知道怎樣處置我的材料，使它們各得其所。至於戲劇，我更始終不敢染指。我所寫的大抵還是散文多。……我自己是沒有什麼定見的，只當時覺得要怎樣寫便怎樣寫了。我意在表現自己，盡了自己的力便行，仁智之見，是在讀者。（一九二八）

知道自己的限度，知道自己的較短處和較長處，老老實實地表現自己，這可以看出朱先生的生活態度和文學態度。「人性解放」，是當時的一種文化思想，「表現自己」，是當時的一種創作方針。誠實地作人與誠實地寫作，產生了朱先生前一年的立誠的文學。背影一文，寥寥千五百言，其所以能歷久傳誦而有感人至深的力量者，當然並不是憑藉了什麼宏偉的結構和華瞻的文字，而是憑了他的老實，憑了其中所表達的真情。這種表面上看起來

簡單樸素，而實際上卻能發生極大的感動力的文章，可以作為朱先生的代表作品，因為這樣的作品，也正好代表了作者之為人。誠懇，老實，是朱先生的本色，可是他絕不迂闊，更不頑固或偏狹。他在「海闊天空」與「古今中外」中說：

人生如萬花筒，因時地的殊異，變化無窮，我們要能多方面的瞭解，多方面的感受，多方面的參加，纔有真趣可言。……但多方面只是概括的要求，究竟能有若干方面，卻因人的才力而異——我們只希望多多益善而已」（一九二五年五月九日，見散文集（你我））

就憑了這多方面瞭解，多方面感受，多方面參加的生活態度，他纔生活得健康，他纔不斷地進步，他的作品中纔避免了那些壞的影響，而發揚了那些優良的影響。

朱先生放棄了詩，又逐漸放棄了記事抒情之類的散文，但另一種散文卻開始了。這就是本來要寫成一本專書而終於只成了語文影中的一部分，題作「人生一角」的若干篇文字。批評「人生」，是這些文章的主要內容，叫做「一角」，這是朱先生的謙虛，言其所見者只是一角，並非人生的全體。年歲大了，經驗多了，情感漸漸收斂，理智漸漸開拓，於是心平氣和，平正通達，嚴肅而不冷峻，溫和而不柔弱。朱先生終其一生，對人處己，觀物論事，一直保持了並發揚了這種生活態度，也就確立了這樣的文學風格。在這一時期，他發展了對於人生的批評，也就發展了對於文學的批評。

八年的抗戰，對於文化工作者的最顯著的影響是「人」的改造，也就是生活的改造和意識的改造。嚴肅而認真的朱先生當然也接受了這影響。抗戰結束了，不料反動派又打起了內戰，廣大的人民是堅決反對內戰要求民主的，反動派爲了鎮壓人民，於是有「一二·一二」慘案，有聞一多先生的被殺，以及接連不斷的各地青年的被迫害。這一切，較之抗戰本身所給與朱先生的，實在更深，更有力。朱先生多年不寫詩了，因爲聞先生的被害，他寫了有名的悼詩，他說：

你是一團火，

照徹了深淵，

指示着青年，

失望中抓住自我。

你是一團火，

照明了古代，

歌舞和競賽，

有力猛如虎。

你是一團火，

照見了魔鬼；

燒毀了自己！

遺燼裏爆出個新中國！

這也可以看出朱先生自己是怎樣地爲烈火所燃燒了。復員以來，他的主要工作是編輯聞一多全集，並於一年之內出版了新詩雜話、語文零拾、詩言志辨、標準與尺度和論雅俗共賞（其中有些是從前寫的或編定的），並編定了語文影。從這些著作，我們可以看出朱先生的批評態度。

綜合朱先生的批評工作，大致可以分作兩方面，就是：他一方面在作歷史的考察，一方面在作現實的評價，而這兩方面又是互相貫通、互相結合着的。

屬於歷史考察的最好的例子，是詩言志辨，這是朱先生歷時最久、工力最深的一部書，從這本書可以看出他如何勤於搜討，詳於辨析，以期發掘出歷史的真象。所以他在自序中說：

現在我們固然願意有些人去試寫中國文學批評史，但更願意有許多人分頭來搜集材料，尋出那個

批評的意念如何發生，如何演變——尋出它們的史跡。這個得認真的仔細考辨，一個字不放鬆，像漢學家考辨經史子書。

並說：

這是從小處下手。希望努力的結果可以闡明批評的價值，化除一般人的成見，並堅定它那新獲得的地位。

朱先生說這是「從小處下手」，但這從小處下手也正是一種基礎工作。假如能掌握這些史跡，進一步再運用科學的觀點和方法加以分析，那就不但可以「尋出那個批評的意念如何發生，如何演變」，而且可以考察它的社會根源，說明它為什麼發生，為什麼演變。

在現實的評價一方面，最鮮明的例子是文學的標準和尺度等篇。在文學的標準和尺度中，於詳切地作了歷史的考察之後，就說到了當時的問題，他說：

抗戰起來了，「抗戰」立即成了一切的标准，文學自然也在其中。勝利卻帶來了一個動亂時代，民運動發展，「民主」成了廣大應用的尺度，文學也在其中。這時候知識階級漸漸走近了民衆，「人道主義」那個尺度變質成爲「社會主義」的尺度，「自然」又調劑着「歐化」，民主與「民主」配合起來。但是實際上做到的還只是暴露醜惡和鬥爭醜惡。這是向着新社會發展的路。受教育的越來越多……文學終於要配合上那新的「民主」的尺度向前邁進的。

而在古文學的欣賞中又說：

人情或人性不相遠，而歷史是連續的，這纔說得上接受古文學。但是這是現代，我們有我們的立場。得弄清楚自己的立場，再弄清楚古文學的立場，所謂「知己知彼」，然後纔能分別出那些是該揚棄的，那些是該保留的。弄清楚立場就是清算，也就是批判，「批判的接受」就是一面接受着，一面批判着。自己已有立場，卻並不妨礙了解或認識古文學，因為一面可以設身處地爲古人着想，一面還是可以回到自己立場上批判的。

從這一類的論述中，就可以看出他的積極的態度和進步的立場來了。也就憑了這樣的態度和立場，他在新詩雜話的若干篇中肯定了詩的政治價值；在語文零拾中的歷史在戰鬥中說雜文是春天的第一隻燕子；在標準與尺度的論標語口號中肯定了標語口號之爲戰鬥的武器；在論雅俗共賞的論朗誦詩中肯定了朗誦詩是羣衆的詩，是集體的詩；在爲何達詩集作的序文今天的詩中，肯定了詩的控訴性與行動性。而當他衡量這些問題時，他的立場是明確的，這也就是他在論雅俗共賞的序文中所說的：「所謂現代的立場，按我的瞭解，可以說就是『雅俗共賞』的立場，也可以說是偏重俗人或常人的立場，也可以說是近於人民的立場。」

在前一期，朱先生寫了若干批評人生的散文，如「人生一角」等；在這一期，他又寫了若

干批評現實的散文，如標準與尺度中的論氣節、論吃飯等，在論氣節中，他肯定了青年知識分子的新氣節，在論吃飯中，他肯定了「要吃飯」是人民大眾的基本權利，並且肯定了羣衆的力量。這類對於現實的批評，和他的文學批評是一致的，互相配合的；不但一致，不但互相配合，實際上乃是他文學批評的基礎，因為決定一個人的文學道路的乃是他的現實生活的道路，而決定他的生活道路的，乃是時代的道路。

作為文學工作的一部分，在語文方面朱先生下過很大的工夫。語文是文學的主要工

具，他對於文學的看法也就決定了他對於語文的看法。他用口語創作，看他的文字如同聽他說話，活潑生動而又親切。他勇於在語文方面作種種試驗：你我一書中有給「一個兵和

他的老婆」的作者，即擬李健吾原著的口語體，第一句是「我已經念完嘞一個兵和他的老婆得故事。我說健吾，真有你得！」給亡婦一篇試想用不歐化的口語。談白話一篇是讀南北

極和小彼得的感想，他說，「兩部書都盡量採用活的北平話，念起來虎虎有生氣。」語文零

拾中有譯文若干篇都是論語文問題的。作為絕筆的未完稿是論白話。從這些，可以看出他不但努力研究，也在努力實踐。與語文研究有密切關係的是國文教學。他在大學裏開過

國文教學一類的課程，他同葉聖陶先生合著了國文教學、精讀指導舉隅等，他編輯國文課本，計劃大學裏中文外文兩系的合併，想使大學的中文系走一條嶄新的道路。這一切，

和他的文學工作相輔而行，都是他的文化工作的一部分，而無處不看出他與時偕行，力求進步，且力求實際有用的精神。

### 三

朱先生在文學工作和生活實踐的道路上都走得非常穩當，非常踏實。和聞一多先生相比，假如說聞先生是狂者，那末朱先生就是狷者，然而狷者之中也有積極的與消極的之分，朱先生是積極的狷者，是並不止於「有所不爲」而已的。特別是後一期的朱先生，從抗日民族解放戰爭末期起，他的思想就在不斷地變化，不斷地進步。雖然由於體弱多病，不能像青年人那樣急風驟雨般地前進，而事實上他比青年人的道路也許走得更堅定，因為他的變化既非一步跨過，也非趑趄不前，而是虛心自省，一步一個腳印走上去的，這也正如他在早年的長詩毀滅中所說的：

從此我不再仰臉看青天，

不再低頭看白水，

只謹慎着我雙雙的腳步，

我要一步步踏在泥土上，

## 打上深深的腳印！

他雖然沒有參加過什末轟轟烈烈的行動，然而他對於這類正義的行動總是全力支持，最少也是發生過作用的。他也沒有什麼激昂慷慨的言論，然而就在他那些老老實實的講話與文字中，真理已一再地放了光。他一直在國民黨反動派的黑暗統治之下過着貧病交迫的生活，然而還是一直堅持着工作，堅持着與惡勢力的鬥爭，他曾經在很多反對黑暗統治的宣言上簽過名，最後，自己雖然窮到不能及時治病，終至為病魔所吞沒，然而還是毅然決然地拒絕了美援麥粉，發表了反對美帝扶日的宣言。這一切，又豈是一個消極的弱者所肯為，所能為！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九日人民日報的新華社社論說，「我們應當寫聞一多，寫朱自清，他們表現了我們民族的英雄氣概。」這光榮的稱譽，朱先生是當之而無愧的。

一九五〇年十月十五日，北京。